

# 必须保卫现代：为什么福柯并非后现代主义者？

董相呈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3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3月24日；发布日期：2026年4月7日

## 摘要

本文探讨福柯理论对人文社科研究的范式革新意义。福柯始于对弗氏压抑假说的质疑，摆脱了以原欲为核心的分析，转向探究权力与知识的共生关系。他批判性超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与结构主义封闭性，发展出强调断裂与博弈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本文认为，此方法的价值超出了文学或任何单一领域的批评，其通过将研究对象“问题化”，为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提供了一种诊断自身知识基础与权力效应的元方法论框架。

## 关键词

福柯，社会历史批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

# We Must Defend Modernity: Why Is Foucault Not a Postmodernist?

Xiangcheng D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March 5, 2026; accepted: March 24, 2026; published: April 7, 2026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radigm-shifting significance of Foucault's theory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Foucault began by questioning Freud's repression hypothesi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analysis centered on primal desires and turning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knowledge. He critically transcended Marxist determinism and structuralist closure, developing a knowledge archaeology and genealogy that emphasize discontinuity and game. This method is believed to have value far beyond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iticism, as it

**“problematize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provides a meta-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diagnosing the knowledge base and power effects of the entir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Keywords

**Foucault, Social Historical Criticism, Knowledge Archaeology, Discourse Analy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在后现代标签之外——作为史学方法论者的福柯

米歇尔·福柯是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其学术影响遍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他的思想难以被简单归类，这不仅源于其广博的知识储备使他能自如拓展研究疆域，也因其研究呈现多元理论倾向。虽然福柯常被视作后现代主义先驱，其著作也确实推动了后现代思潮发展，但他不应被简单归入这一阵营。相反，福柯始终致力于以跨越常规理论框架的书写实践，重新勾勒历史轮廓。

值得反思的是，尽管福柯在当代思想史中屡被归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这一分类本身的合理性及其方法论后果却鲜少被加以系统探讨。本文认为，将福柯纳入后现代主义谱系，往往会掩盖其理论工作的关键维度——即以历史书写为核心的知识诊断方法。通过分析福柯的思想形成路径及其与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张力关系，本文将论证：福柯的理论实践并非意在瓦解历史理性，而是期望重构一种面向当下的、非连续性的史学方法。由此，文章试图重新界定福柯在当代思想光谱中的位置，并反思后现代主义分类框架本身的解释限度。

## 2. 理论的奠基与决裂：从精神分析到权力 - 知识

出身于法国一个氛围保守的中上层家庭，很大程度上，这种背景与福柯的个人取向及生命经验形成根本对立[1]。反抗父权、精神病症困扰及无神论立场，共同塑造了他堪称离经叛道的研究兴趣，并最终汇聚于其理论的核心——对权力运作机制的持久追问。毫不夸张地说，福柯的研究初衷大致正是要反抗既有认知中存在的一切因循守旧的观念与事物，就像尼采对一切旧价值所采取的、近乎本能式的进攻姿态。且尽管福柯并不多在理论著述中流露出过于鲜明的善恶判断或价值导向，他所展现出的一切批判最终都汇聚为对权力的批判——这种关切权力运作的技术哲学长久以来已在事实上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中。

在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两种主流思潮对立下形成的思想分野中，福柯反而另辟蹊径，尝试贯通了一条挑战意识形态一致性的批判路径。一方面，福柯表现出对弗洛伊德理论框架的刻意而坚决的拒斥。从根本上说，他对弗洛伊德语境中之几乎一切推论都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原欲概念及其下派生的压抑关系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尽管弗洛伊德将其视为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在弗洛伊德的逻辑中，压抑构成了无意识形成的驱动力：本我(id)，作为一种超出意识控制的原始驱力，其持续作用进而促使原始冲动产生，在道德文明的话语趋于饱和的过程中，这些冲动被逐渐形成、日益完备的社会规范驱逐至无意识中，并通过寻求特定症状(神经官能症等)实现自我表达，当人类将情感贯注转向于外部的形形色色，使得自己能在自身以外体验到自己内部的心理过程，其被压抑的情绪在这种心理作用的倾向下最终以投射的隐晦方式重新浮现[2]。

对弗洛伊德而言，压抑机制具有内在的双重作用——既是病理的根源，同时也是文明延续的前提。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将个体心理异常提升至文明尺度，提出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反映了原欲(libido)的演变。他断言文明通过压抑本能来建立秩序，然而这种压抑同时给个体带来了痛苦。关键在于，弗洛伊德将压抑的起源归因于文明本身的病态运作，将其表述为社会组织的结构性矛盾，而非心理异常。意味着，融入社会领域必然导致性异化——对情欲自由的压制。他所提出的文明三重标准(“清洁、秩序与美观”)一定程度上如同一个脱离实际、近乎乌托邦式的三段论，缺乏实用基础。

该假说逻辑连贯且不言自明，这解释了其为何广受接纳。人们倾向于相信十七世纪标志着一个压抑时代的开始，在此期间提及“性”变得愈发困难且代价高昂，因为关于性的自由言说在语言上受到管制，并被系统地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然而，福柯的反对则昭示对压抑假说的根本性质疑。历经三个世纪的现代性转向所形成的现实却截然不同：围绕“性”这一概念发生了事实上的话语爆炸。尽管主流话语内化了约束结构，融入语言和言说的政治机器——这一现象既是自发的，也同时是协商的产物，伴随着古典时代的社会重组而出现——但性话语的加速扩散并未因介入性的语言净化而停止([3], pp. 31-32)。

福柯关于性话语的分析揭示了类似的话语机制：所谓的性审查，并非通过沉默消除性，而是通过规范化的限制，生产出越来越多可被言说、被分类、被管理的性话语。语言的纯化实践与生产共同体体现了规范化话语的运作逻辑：通过设定边界与禁令，话语得以不断复制、扩展并嵌入权力关系之中。性话语在权力结构中灵活运作，经由非常规形式被激发显现。其本质在于：性被驱赶出隐蔽状态，而被迫过一种话语性的生活。性话语的激增，不应被理解为仅仅是权力外部或与权力对立的力量；相反，它在权力领域内运作，充当其机制的器具([3], p. 46)。在福柯看来，话语的转变是权力运作的产物，彼时不为人所容的性学反而在旷日持久的激烈话语煽动下成为一时显学。

然而一个关键的洞见在于：即使其起源被阐明，权力的机制也很少遵循逻辑推演；其运作方式往往是反直觉的。福柯对压抑假说这一论调的反对，首先即体现在他对原欲本身的绝对重要性所发出的诘问：在异化的社会语境下，欲望的转移过程自然地脱离了传统概念上的性本驱动模式——脱离了拉康所拒斥的零度满足[4]；性异化带来了欲望对象在本质上的偏移，是“在幻想结构中的位置变更”。更确切地，升华将某个对象重新定位在了原质(thing)的位置上，这种意义上的冲动并非是由该对象任何固有属性所派生的，而仅仅是由于该对象在象征性的幻想结构中位置的一种效果，易知原欲转移机制中的联系由此被复杂化，不能按固有的直觉性逻辑展开推论。这一批判理念的核心在于将“性”从心理学命题转向历史建构问题，追问其如何被话语生产。此转换将研究对象“历史化”，为知识考古提供了操作模型。<sup>1</sup>

### 3. 思想的对话与超越：穿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

同样，福柯的理论框架有其鲜明的马理论底色，尽管要指称福柯本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明显是不恰切的；福柯的努力是通过有选择地应用特定方法论，对成问题化的主题自特殊角度切入并深入研讨，而非对某种特定理论加以全盘接受。最显著地，他的论调中反复体现着多元决定论的影响，这体现在他将权力分析为一个不平衡、异质性且不稳定的、富有张力的力量关系网络，这些关系凝结成“战争或政治策略”。[5]

由此视角，福柯细致剖析了权力的运作机制、它在其他社会关系中的内在性、其自下而上的形成方

<sup>1</sup>但对弗洛伊德的评价也应摒弃简单的观念性谬见。尽管将父权社会观察所得经验直接用于阐释父权制起源，不免陷入同义反复。然而，弗洛伊德的伟大并不限于对意识分区、对无意识内源的把握，而更在于提出“内化与外化”：个体人格成长与社会文明演进呈现出深刻同构，但本能与文明之间呼之欲出的恰是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对立，二者张力既毁灭又生成。弗洛伊德的贡献不在承续理性主义传统，而在阐明其错位关系——由人上升至文明层面，又以尖锐对立形式返回人本身。作为人精神道德建设产物的文明，非但不是目的，反成为妨害健康的对立面。因而，即便其理论中某些假设无法量化，人们仍能在互释中获得情感共鸣与自我理解——这套自洽的话语体系，既是一组理论、一种临床方法，亦是一种叙事结构与阐释框架。

式及其非随机化的选择性——这种分析方法本身就反对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如经济决定论或生产至上主义。惯常而言，马克思主义将权力问题局限于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等制度化领域，这在福柯看来，非但未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维度，反而将其重新纳入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运作逻辑，将权力问题“贫困化”。福柯指出，权力远比法律、国家机器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若仅以此看待权力，必将遮蔽其真正的运作机制[6]。

同样，福柯也极力避免盲目尊崇实践路线或辩证法的方法论，这一倾向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巴黎高师时期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思想交流。阿尔都塞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从单一化的实践参与和黑格尔辩证法中剥离，以超越教条式经济主义的局限；他倡导“保卫马克思”，意在恢复一个摆脱失准注释层的马克思——那些注释塑造了著作的接受方式，却阻碍了对原始立场的直接理解。为此，阿尔都塞试图通过结构主义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将文本视为自足系统，其答案必然在文本内在逻辑中得出。他旨在将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严谨性分离，主张一切科学都需基于科学理性和辩证唯物主义接受审视。立足于能指与所指的任意关系，科学必须“纯粹满足内在要求”，其真理性与命题的可证伪性无关。换言之，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性分析，从生产关系的维度转置到了话语、权力与主体性的领域——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被保留，但解释框架被重构。

这种观点也在福柯的理论研究方法中显露无疑，体现在他在材料发掘过程中所展现出对历史性的偏重与对总体性及规律的拒斥。在学术生涯的中早期，福柯的研究目标可以被概括为“在历史中探究人类的经验形式”：一方面通过哲学、人类学的方法对经验性的行为做准确定义；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历史研究方法确定这种经验的产生条件。所谓孤证不立，这两种方法论显然是在互相补足、彼此引证的，进而达成材料与哲学相调和。但不可避免的是，对于福柯而言，这种研究理念仍然是结构主义的，但他所寻求的却绝非对科学性规律的把握。

在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潮上的深刻转变。结构主义事实上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内部危机的产物出现，同时被视作一种旨在完成马克思主义未竟事业的思想现象兴起。作为对西方历史特定时刻的一种抵抗和回应，结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一种自我憎恨——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拒斥以及对现代主义新范式的渴望。结构主义试图通过强调结构的优先性，使人文学科走向类似自然科学的知識形態——研究者可依循不依主体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获得解释。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上升为超越事件本身的、规律性的科学对象，赋予其解释的终极性。然而，这种将结构加以本体化的努力，反而使结构主义重新落入本质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陷阱——“结构”在此成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意义中心的替代品。

福柯的理论实践虽然在早期与结构主义共享同一立场：对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的拒斥，其核心关切并不在于为人文科学奠定一种新基础。相反，通过将话语结构置于具体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之中，福柯持续警惕结构被去历史化和本体化的风险。在这一意义上，福柯并非试图以结构取代主体，而是通过对其本身的历史化处理，使其始终处于可变、可分析而不可崇拜的位置。他所寻求的是超脱于单纯的结构主义或任何被正典化的理论体系阈限(譬如马理论)，<sup>2</sup>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作他对西方文明的虚妄文化兼容性所发出的挑战——他笃信其知识来源和条件可能正是对知识对象的隔离，当学者们关注马克思经典著作多于对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关注，这意味着脱离实际、脱离具体分析，而盲从种种定理或总体性。

在《力与意谓》中，德里达曾指出结构主义并不外乎是一种“对既成的、已建构的、已创建物的反

<sup>2</sup>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转变在这方面是很典型的，他在70年代已经直截了当地得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方式[见论著《性经验史》第一卷及讲稿《必须保卫社会》——它包含了对意识形态机器等概念的直率批判]。然而时至今日，应当试图在更长、更复杂的演变中辩证定位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而非将这个问题理念化、绝对化。

省”，因而注定具有历史的、末世的和颇近黄昏的特质，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过渡形态受限而存在[7]。在他看来，结构主义或许会被解释为对力的关注的一种松弛，只是，对力的关注本身，也是力的一种紧张。这就是说结构成为一种非实体化的本质，尽管这种本质不再凝固化，而是一种生成和建构性的隐性关系；在此语境下，结构主义语言学从符号系统演化为话语运作，人们所习见的那种内部动源，将自己隐去，甚至不在场，可这种缺席状态却丝毫不影响这种隐蔽整体结构作为意谓的交互作用。

70年代，受现实中“五月风暴”与理论界法国马克思主义“尼采转向”的双重影响，以进入法兰西学院并发表《词与物》为标志，福柯的研究方法由知识分类的考古学向知识生产的谱系学转变。谱系学方法的内核就是反对传统哲学中的总体性历史观；而福柯超越结构主义的关键[8]，在于将结构本身历史化：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视为跨历史对象，他在《词与物》中追问知识型(*épistémè*)的历史形成机制，揭示不同时期知识型的断裂是话语实践重组的产物。这种“历史化的结构分析”既拒斥经济决定论，也摆脱了去历史化倾向，将结构本身作为历史考察对象。这一方法成为谱系学前身，通过对惩罚、规训等具体问题的历史分析，揭示权力如何塑造现实。最终，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双重超越，落实为以断裂性、偶然性为核心的史学实践——知识考古学由此成为他书写当下的方法论基础。

#### 4. 范式的确立：考古学、谱系学与“书写当下”

当德里达试图以解构的方法瓦解一切形而上的力与其质时，<sup>3</sup>福柯却并未采取这种带有毁灭性的方式去对待既成结构，恰恰相反，他通过材料的并置实现从力之暴政中的逃逸，使书写的不同部分彼此呼应又相互逃逸。如果说前文所讨论的“可然”与“必然”的混同，乃是通过将词语的分类结构误认为事物本身的自然秩序而得以完成的，那么病理学中的本质论倾向正是这一逻辑在医学知识中的具体体现。

同样的病理学研究中，福柯则批判了传统医学的本质论倾向——无论是器质性病理学将疾病视为先于症状的本质，还是精神病理学在症候群与心理根源间建立抽象联系，都囿于自然主义的分类框架。<sup>4</sup>他提出一种后结构主义思路：强调节段现象与机体整体的连带性，但这种关联既非消解局部于整体，亦非抽象演绎；相反，在重视全体性的同时，每个节段都成为可能的、自我指涉的统一性。这意味着病理学应摒弃“元病理学”公设，不再依赖经验化的抽象平行性，而需回归具有历史性的具体形式。这种对被遗忘具体历史的追溯，旨在瓦解词与物之间被预设的同一关系，揭示医学知识作为一种历史性话语的生成条件。

如果说知识考古学旨在揭示话语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构成其对象，那么谱系学则进一步将分析重心转向权力关系及其在身体与实践层面的运作。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揭示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往往在形式主义的僵化中被物化为不可更改的自然法则；事件化的历史过程由此被剥夺其生成性，而转化为必然秩序的外在体现。这一分析从根本上动摇了将结构视为稳定框架的认识论前提，此过程从根本上质疑了共时、历时性(*synchronic/diachronic*)的二分法观点。大多数人会认同结构主义的基础蒙恩于索绪尔，尽管他本人并不会如此宣称。但事实是他的工作催生了一场认识论革命：类比主义(*analogism*)代替了进化主义(*evolutionism*)，模仿(*imitation*)代替了派生(*derivation*)。通过引入这对双生概念，索绪尔实际上强调了共时性相对于历时性的优先性。此举预示了后来的反历史之争，因为优先共时性，

<sup>3</sup>德里达意义上的哲学，指的是围绕着一个理论性主体而建立的尼采-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传统形而上的理论逻辑，解构哲学并不废弃它的一个总体理论定位。因而在他笔下，“哲学的终结”远非那种带着休谟式怀疑倾向的不可知论诡辩，相反，他仍旧热忱于探寻哲学的边境。当德里达说“要尊重我们解构的东西”时，就决不同于一些论者将解构仅仅理解为强调单向度否定和消解的说明。<sup>4</sup>福柯对“症状直观反映疾病本质”这一传统逻辑持批判态度，质疑其中从“可然”推及“必然”的经验化逻辑律。早在《精神疾病与心理学》中，他就指出观念病理学的总体化倾向：在自然主义公设下，疾病被视作先于症状而存在的“本质”，可通过症状加以识别。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则进一步阐明，疾病“实体”与病人肉体的精确叠合，仅是历史性的暂时事实。当凝视占据主宰地位，它便在同一感知领域内，瞬间同时读出机体病灶与病理形式的关联——这种看似直观的“一瞥”，实则是权力运作下的真理建构。由此，被视为科学的心理病理学，在漫长的习见积累中已然异化为一种文化现象。

其最终必将揭示的是历史的无意义性。

盖鲁(Martial Guéroult)曾论证过, 尽管历史与哲学存在尖锐对立——历史是时间性的、偶然的, 哲学是永恒的、必然的, 但它们的和解在于将思想体系提升至与历史同等的地位。哲学将历史怀疑论与教条僵化融合, 将体系从历史时间性中解放出来, 并超越其表面的异质性。通过否定时间性和历时性, 现代性以“深层结构”来标记时代, 意义必须在此深层结构中寻求, 当历时性被简化为纯粹的派生时, 语言的演变就变成了从一个共时状态向另一个共时状态的转变——这一框架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中提出的“知识型”(épistémè)概念相契合。

早在启蒙时代, 康德和费希特等思想家就提出了一种结构主义方法论来完成思想的哥白尼式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 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一直延续至现代。直到福柯谴责哲学变得过度制度化, 以至于试图回答康德曾经回避的那些根本性问题——本质上, 即如何理解当下现实的问题。福柯的方法是结构性地描述和重构历史, 而历史本身是双重结构性的: 分析是结构性的, 方法论也是结构性的。事实上, 结构主义探究的根源可追溯至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Cratylus*)中, 克拉底鲁(Cratylus)与赫谟根尼(Hermogenes)就自然与文化两种对立观点展开辩论: 克拉底鲁秉持柏拉图的模仿观, 认为语言通过语词复制自然; 而赫谟根尼则认为语词是任意赋予事物的——此立场预示了索绪尔关于语言任意性和差异性的定义。在指称(denotation)中无限衍生涵义(connotations)的动态过程, 事实上揭示了结构主义固有的反经验主义和反功能主义特征。

正是在对这一理论遗产的反思中, 福柯逐步转向谱系学方法。与试图在深层结构中寻找意义的做法不同, 谱系学关注权力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塑造身体、规范行为并生产真理。历史在此不再被理解为通向某种总体意义的连续进程, 而是由断裂、偶然与斗争所构成的场域。通过对惩罚、性、规训等具体问题的分析, 福柯揭示了权力并非外在于主体运作的压制性力量, 而是通过微观机制渗透进日常生活, 持续塑造可被经验到的现实。对福柯而言, 他的工作即是如此转向了新的研究对象, 取代了现象学对内在生活经验的关注。

## 5. 贡献与回响: 通往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

简言之, 福柯旨在探索人类所言说和践行的内容, 在这些行为中寻求连贯性, 而非推测未言明之事。福柯曾对自己的史学研究理念概括过: “如果这意味着以现在之名书写过去的历史, 那我不感兴趣。如果这意味着书写当下的历史, 那正是我所感兴趣的。”<sup>[9]</sup>通过将研究对象历史化, 福柯有效地将结构主义也历史化。他审视了使科学话语既有效又可能的条件, 揭示了在科学边缘权力与知识交织互动的复杂关系。这种史学立场呼应了克罗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 反映了福柯对共时性优先于历时性的强调——这一点可以被归因于自冈圭朗至拉康至福柯这种一脉相承的反心理主义立场。

拉康拒绝将弗洛伊德理论器质论化, 颠覆了精神分析与传统精神病学的关系。他反对历时性阶段论, 在《罗马报告》中借助索绪尔语言学赋予共时性优先权, 重新阐释抗拒与移情。这一转向使连续阶段论不再居于核心, 并在方法论上影响福柯关注已被问题化的社会实践<sup>[10]</sup>。福柯的特殊方法始于批判压抑假说, 转而尝试揭示权力如何隐秘地生产知识, 并通过相关话语的激增来强化自身,<sup>5</sup>从而形成一个权力、知识体系相共生的系统, 正如《性经验史》中所探讨的那样。

而所谓知识型概念的提出, 根本上在于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和断裂, 这在《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中所描述的由文艺复兴、古典至现代知识型的激进转变中得到例证。通过优先考虑共时性而非历

<sup>5</sup>福柯指出, 性倒错、早熟性行为等概念的认识与实践往往在特定历史时期集中爆发。《临床医学的诞生》中, 他强调疾病与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因此不同时代盛行的疾病各不相同。同理, 一个时代广为流传的文艺作品, 可被视为广泛施加影响的集体心理症候群, 它们共同参与反映社会上层建筑, 本质上是特定时空下时代精神的隐晦表达, 深受当时社会形势与生活状态的塑造。

时性，他将结构主义工具历史化，进而质询科学话语得以出现并与权力交织的条件，这一框架是福柯后期研究的核心。凭借谱系学方法，他事实上解构了线性的进步叙事，揭露规训技术如何渗透日常生活。福柯的史学始终立足当下，通过将社会实践问题化，批判性地揭露权力运作被自然化的幻象。<sup>6</sup>究其根本，最终所实现的即是颠覆了传统史学对连续性、人文主义主体性和所谓中立性的依赖，开创了一个围绕权力-知识-主体三元核心的后结构主义范式，从而革新了解构传统性机制的方法论。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源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思潮，可将其出现视为对社会变革的响应。其初现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画家约翰·沃特金斯·查普曼首次使用“后现代的”一词，其并非指对内容进行颠覆和解构，而更多地强调对当时前卫画派的超越，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精神。之后，“后现代”的术语逐渐渗透文艺批评、社会学和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们所关注的，并非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审美“流派”，也不囿于狭义的先锋派思潮，如简约主义或概念主义等<sup>[11]</sup>。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无法被独立归类为人文或社会科学中的任一独立学派，这源于其固有的反系统性、跨学科流动性及自我颠覆的批判性。<sup>7</sup>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在于其对元叙事的拒斥，包括对学术理论“学派”或“运动”这类概念本身的怀疑——这些范畴预设了清晰的理论边界、统一的方法论和共同的研究议程。后现代主义通过其跨学科的混杂性积极抵制传统分类逻辑，试图弥合学科界限，同时规避教条化。利奥塔认为它构成了对“共识暴力”的抵抗。

因此，将任何学者标签为后现代主义者本质上都是成问题的，因为这个刻意非统一的思想谱系在逻辑上即已在抵制同质化，并包含着内在矛盾。在时间维度上，此类分类同样证明是不充分的。詹明信将后现代转向归因于我们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体验的危机，其中空间范畴最终主导了时间框架——因而哈维指出：这种转变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展开，致使人类凭自主理解难以跟上<sup>[12]</sup>。在这种令人迷失的后结构主义时代语境之下，时空感知处于动态变化中，后现代性显现为对本能性时空体验模式的破坏性反叛。而福柯的史学方法则是通过新历史主义策略体现了激进的微观分析，解构宏大叙事以揭示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动态、历史性和文化特殊性。

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是其微观史学实践学话语宣称对真理拥有独家合法性的权威。尽管表面上看似反理性——因其关注被理性遗忘和压抑的疯狂特质——但他的工作最终强调的是理性运作中被遗忘和压制的维度。福柯并非拒绝理性，而是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它，动摇了理性与进步之间的直觉性等式。他的探究契合结构主义的核心主题：将多样化的知识形式还原至其基础的“零度”——即写作、语言、亲属关系和无意识等未分化、尚未分类的状态。他曾说过：“我试图书写的不是一种语言的历史，而是这种沉默的考古学。”<sup>[13]</sup>对他而言，历史分析在政治话语中居于重要地位，需对历史化叙事持续质询。其目标并非重建修正主义历史，而是将探究从主导话语的沉积中解放，揭示真理与权力的共谋，以及知识作为权力效应的延伸。这种碎片化、以权力为中心的史学不追求叙事连贯性，而是提供一种去视角化的方法论，以开启未来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福柯的计划回应了康德所呼唤的二律背反，通过将历史本质植根于人类认知的问题性来回应笛卡尔的“我思”悖论。

这一方法论转向并非简单意味着对文学研究中形式或话语维度的回归，而更深刻地指向一种对文化实践本身的重新理解。对福柯而言，真正构成研究对象的并非“文学”这一孤立领域，而是由多种话语、制度与实践交织而成的文化配置；文学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并非特权化的场域。在这一意义上，福柯

<sup>6</sup>福柯曾谈到，他那一代人受巴塔耶、布伦肖等文学领域的作家及他们对“边缘经验”的文学发掘影响很深。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种被边缘化的经验极少受到社会和文化对它们正向化的价值侵染，这更有助于得出客观研究结果。

<sup>7</sup>后现代时代的来临呈现出多重征兆：摇滚乐、科幻电影、普普艺术、致幻剂、个人电脑的兴起，伴随政治与文学的衰落，以及“前卫”概念的消亡——这标志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催生一种难以定位的文化状态，“什么是文化”这一根本规范已发生断裂。与其说后现代是对现代的简单颠覆，不如说它是一种总体上的断裂；其反对倾向虽由不利社会环境引发，但在运作中，本质问题在于“反对”本身变得有目的性。

的工作并未背离人文研究对自由与实践的关切，而是试图在摆脱形而上学预设的前提下，使这种关切重新获得历史与分析的可操作性。

福柯的话语分析区别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他不追问文化文本所反映的阶级立场，而关注其作为话语实践如何建构特定历史条件下“可思”与“可言说”的边界。重心从再现关系转向生成条件——在特定知识型中，语言、叙事与修辞使“疯狂”“性”等经验对象得以被界定并获得真理地位。由此，《疯癫史》并非文学阐释，而是对一整套文化话语如何共同构成经验对象的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其后期引入的谱系学方法进一步推进了问题意识。谱系学拒绝将任何文化范畴视为超历史的、自明的对象，而是追问这些范畴本身如何在特定权力-知识机制中被建构并获得权威性。由此，文学不再被预设为一个天然存在的审美领域，而被还原为现代文化中逐步确立的一种分类方式：哪些文本得以被纳入正典，哪些书写被排除在外，这些界限并非源自内在价值，而是权力关系在文化层面的具体结晶。通过这种方式，福柯并未消解意义或实践的可能性，反而使文化的历史条件与当下效力得以同时被看见。

因此，福柯对人文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提供新的阐释或意义，而在于开辟了一条“成问题化”的思考路径：它促使研究者从探寻文本的内在深度，转向对文学生产所处的话语网络及其权力效应展开批判性质询。

然而无论是在古典人文主义者还是其现代后继者手中，这种回归后达成的自由始终是人类进行批判性自我创造能力的核心，究其根本，“回归”的实质仍然是回到对欧陆哲学一以贯之、几度起落的主体性思维的探讨。福柯的思想遗产即在于重新激活了这种精神，不是通过教条，而是通过对历史与权力、理性以及人类解放这一未竟事业间关系的深刻重构。<sup>8</sup>

在研究末期，福柯主张史学研究应发展成为他所谓“一种关于自身的批判本体论”(“a crit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这种方法自觉地继承了古典人文主义通过文本批判进行伦理重建的传统，正如彼特拉克通过诠释学研读古罗马经典所生动展现的那样。区别在于福柯有意调整了批判的指向：人文主义者审视文本，而他则在更高层面上剖析着那些无声地构筑现代生存的规训机制——规训思想的学校、规训身体的医院。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明确的“拒绝我们所是”的目的。通过考古学式地揭露权力在这些装置中的历史沉积，他的计划通过历史意识点燃了抵抗的火种，将人文主义的解放冲动激进化以适应后启蒙时代。

悲哀的是，尽管福柯本人通过加诸于这些最为私密且危险话题的怀疑事实上达成了一种尼采意义上的英雄主义，他的追随者却仅仅是在用这种方式将他人的话语去合法化，与此同时将自己的话语合法化，这种意义上，英雄式的虚无主义只是被庸俗化成为一种盲从主义(me-tooism)。

文题《必须保卫现代》对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的化用，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辩护或复归。“保卫”的概念，并非将现代性奉为不可触碰的价值体系，而是意味着对其进行认真而持续地批判性承担。在福柯看来，现代性最重要的遗产并不在于其具体制度、规范或价值观本身，而在于一种将自身置于问题之中的批判精神。正因如此，要保卫这一精神，就不能将其凝固为教条，相反，必须不断以之反思其自身的历史条件与权力效应。

从这一立场出发，福柯所从事的工作并非旨在重建某种修正主义的历史叙述，也不是为现代性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而是将探究实践从主导话语的沉积中解放出来，揭示真理与权力之间持续运作的共谋关系。正是在这种对当下的历史化书写中，批判不再以否定为终点，可期的反而是某种未来可能性的

<sup>8</sup>不乏有学者指控福柯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福柯的研究从来不立足于某些具体结论的提出；成“问题化”的分析理念是谱系学方法的操作核心：既作为分析路径，也作为分析对象，最终回归到的必然结果并非被提出的问题，而是事物如何被构造为“问题”的这种特定问题化过程，不是提出问题，而是追溯其成形史；要探究的也绝非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事实本身。因而指称福柯为新历史主义者也是不够公正的。

开启。

### 参考文献

- [1] Macey, D. (1993) *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Hutchinson.
- [2] 弗洛伊德. 文明及其不满[M]. 严志军, 张沫,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88.
- [3] 福柯. 认知的意志(性经验史第一卷) [M]. 余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 [4] 齐泽克. 斜目而视: 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 季广茂,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45.
- [5] 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125.
- [6] 林青. 基于《资本论》的权力形态分析: 马克思与福柯[J]. 哲学研究, 2023(11): 24-32.
- [7] Derrida, J.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 王雪. 马克思与福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两种超越[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1(6): 205-214.
- [9] 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董树宝,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33.
- [10] Lacan, J. (2006) *The 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 In: Lacan, J., *Écrits*, W.W. Norton & Company, 237.
- [11] 曹翊君, 王雨辰. 艺术传播的后现代转向: 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对话[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5, 54(6): 41-46.
- [12] 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M].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51.
- [13] 福柯. 疯癫与文明: 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62.